博物館、人類學與台灣原住民展示[1]
—歷史過程中文化再現場域的轉形變化

收稿日期：2007 年 03 月 26 日
接受日期：2007 年 06 月 27 日

胡家瑜*

摘　要

本文主要從博物館人類學的角度，探討台灣原住民相關展示的發展變化，並由此探索標本採集、人類學知識生產、和展示再現的複雜互動過程。文中將台灣原住民展示大致分為五個不同階段，分析各階段代表性博物館或類博物館機構展示特性和動力的差異。首先，是早期外來者好奇觀異的零星呈現，以及19世紀中葉以後「好奇心陳列室」(cabinet of curiosities)的出現。1895年日本取得臺灣之後，人類學者展開實地踏查、族群分類和大規模標本採集行動，形成了科學性展示的基礎。同時，原住民展示逐漸成為殖民統治者運用的管道，對比呈現原始和文明進化發展的概念。1930年代以後，學術取向的展示，逐漸在人類學研究機構中定型，例如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設置的標本陳列室，以及台灣光復後中央研究院設立的民族學研究所標本陳列室等，這些展示大都與學術研究密切結合。1980年代起，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和政治鬆綁，原住民文化展示在多種不同型態的博物館或文化村內成為熱門主題；最近10年間，大量成立的部落文物館或文化館，更成為政經資源競爭和自我意識建構的場所。本文透過檢視不同階段原住民展示的發展變化，試圖進一步思考文化展示再現的意義，以及其中反映的社會脈絡和權力關係。

關鍵詞：再現場域，文化再現，博物館人類學，類博物館機構，展示叢集，具體化，文化賦權

---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1] 本文初稿發表於2006年12月17日日本北海道大學「先住民と大學-台灣先住民との對話」研討會，會中對話人和提問者的許多寶貴建議，對本文的修改提供很多幫助；此外，二位匿名審查人的問題和意見，也有助於釐清本文的一些盲點和疏漏，在此一併致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博物館與人類學的關係非常密切，性質也很相近；二者的緣起都建立在好奇蒐「異」的基礎上，也都具有跨界互動的意涵。回顧過去一百多年來，人類學研究領域的發展，出現過二波博物館熱潮。這二波博物館人類學(Museum Anthropology)風潮，雖然都與異文化收藏展示有關，但是強調的重點和取向卻大不相同。人類學專業19世紀中葉在歐洲興起，與博物館中異文化標本的大量累積有關；而異文化相關展示，也配合人類學知識體系的建立，成為博物館展出的重要主題。有些學者因此將1840至1920年代，稱為人類學的「第一個博物館時期」(The First Museum Age) (Sturtevant 1969; Stockings 1985)。此時期強調在博物館內進行靜態的物質文化研究；主要是歐美學者從實證科學的角度出發，針對「前工業」(pre-industry)社會的物質文化標本進行採集、搶救和研究。不過，隨著人類學研究方法和理論興趣的轉變，1920年代以後，博物館內的異文化標本研究逐漸脫離人類學主流。直到1980年代以後，由於另一波批判反省思潮的興起，博物館才再度成為人類學者關注的對象(Clifford 1988, Vergo 1989, Ames 1992, Pearce 1992, Appadurai & Breckeridge 1992)。新的一波博物館運動，持續從20世紀末延燒至21世紀初的今日，範圍遍及世界各國，層面也更加廣泛，因此有些學者稱之為「第二個博物館時期」(The Second Museum Age) (Phillip 2005; Rowlands 2006)。不同的是，第二個博物館時期不再強調客觀知識的生產和靜態的器物研究，而是將博物館視為一種現代社會的特殊產物，以及各種人群、物質和想法跨界接觸的場域。由於主要是從動態的人、物和社會關係互動角度，檢視和批判博物館對價值、品味、權力、知識、記憶和認同等影響，因此這個階段也常被稱為「後殖民博物館的時代」(Age of Post-colonial Museums)。[2]

近年來，不少新博物館學研究者，將博物館及博覽會、文化村、主題公園或藝廊等「類博物館機構」(quasi-museum institutions)，歸類稱為「展示叢集」(exhibitionary complex)，比較其間展示模式、空間結構、權力關係、文化認同、休閒觀光與消費等問題(Urry 1990; Hall 1994; Bennett 1995:59; Shelton 2006: 480)。雖然這些展示機構的型態和目的差異很大，但主要都是運用圖像和文物的安排呈現來傳達觀念想法，並形塑大眾的觀看經驗。更重要的是，每一個展示都是一個再現場域，是在不同時空架構和不同知識佈局中運用一套象徵符碼構成的空間場景；與此同時，也呈現一套安排事物和人群的秩序，讓觀眾透過置身其中的觀看和經驗而建構價值與意義(Clifford 1988；Duncan 1991；Bennet 1996)。其中，原住民相關的展示，由於隱涉他者和我群定位，

[2] 相關討論參見Bourdieu 1991; Walsh 1992; Ames 1992; Duncan & Ley 1993; Simpson 1994; Bennett 1995, 1996; Macdonald 1996, Kirshenblatt-Gimblett 1998; Crane 2000; Rowlands 20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且具體呈現自我和他者的形貌，因此更加成為檢討權力運作與認同建構的關注焦點(Ave 1980；Cruikshank 1995)。

受到國外研究思潮變化的影響，台灣博物館人類學界對於原住民展示的分析討論，也逐漸在1990年代以後出現。一些學者開始提出方向性和概念性的介紹和評論(任海1993；王嵩山1992；許功明1994、2004；陳茂泰1997；盧梅芬2005)。另外，有些研究也進一步分析比較不同博物館和展覽會中原住民展示的意涵(許功明1997、1998；胡家瑜1996、2005；陳隆智2002；陳錦豐2001；喬宗恣2002；胡嘉玲2002；石川豪2005；錢曉珊2006)。不過整體而言，有關台灣原住民展示形成與轉變過程的歷時性討論並不太多。因此，本文試圖以原住民展示再現的系譜做為分析主軸，討論五個時期的轉變─從早期模糊混雜的好奇觀異呈現、科學調查採集和系統分類展示、殖民統治和進化展示時期、人類學研究與族群分類展示、以及近年來多元展示管道和自我呈現意識的發展。這些階段性的變化，一方面受到世界性博物館發展風潮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反映台灣社會獨特的歷史過程。[3]透過原住民展示的分析研究，本文將進一步探討展示背後涉及的跨文化標本採集、知識觀點、再現技術、和社會權力關係；並且從另一個角度，檢視台灣博物館人類學的轉變歷程和發展方向。

一、認識與呈現「他者」的起點

展示是建立在認識和再現的基礎之上。對於台灣原住民的認識和呈現，無疑是外來勢力與臺灣本地社會長期接觸互動的結果。從歷史文獻資料可知，台灣原住民在16世紀之前已經與海上貿易者如日本人、中國人和西洋人有交換接觸；17世紀起荷蘭人、西班牙人、和中國人更陸續進入台灣地區長期居住生活。但是，過去對於原住民過什麼樣的生活、有哪些不同群體和文化特性，很少有系統性的認識和記錄。十九世紀之前原住民形象的具體化，主要是透過紙和筆傳達；早期歐洲人的遊記和漢人的風俗圖出現一些描繪原住民的圖像。這些圖像零星片段地呈現當時外來者對原住民奇風異俗觀看焦點，例如獵頭、捕鹿、渡河、干欄式高架屋、水平織機、婚禮等。大部分

[3] 這五個不同的台灣原住民展示再現階段，在時空軸線上反映了台灣社會殖民現代化的獨特歷史過程，包括19世紀之前清代漢人對原住民的分類界定概念、19世紀中葉台灣開港後歐美勢力的介入影響、19世紀末期以後日本殖民政府引入的現代國家國家統治技術、台灣光復以後本土文化的定位和權力關係等。不過，其整體發展趨勢，還是配合著世界性的博物館運動方向而移動，例如從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的靜態、客觀、科學知識的追求和建立，而出現的一波博物館和展示風潮；到1980年代後期以來，強調動態、多元、地方認同和權力關係反省而衍生的另一波博物館和展示熱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描繪的圖像因為缺乏具體細節而顯得模糊籠統，表現出強烈的主觀印象和偏見(圖一、二)。[4]

19世紀中葉起，清帝國統治下的臺灣，受到英法聯軍戰敗的影響，在封閉200年後對歐美各國開放。當時來台派駐、經商、或傳教的西方人，也陸續開始與臺灣原住民接觸互動。其中，1871年加拿大長老教會派來台灣的第一位宣教師馬偕(Lesile G. Mackay)，他深入北台灣地區各聚落傳教，順道拍照與採集標本，可說是早期開始收藏展示台灣原住民器物的代表性人物。除了動植物和地質標本之外，他從原住民部落採集的文物，包括許多不同類型的標本，如服飾、武器、生活器用和宗教用具等；尤其包含許多現今難得一見的北部和東北部平原的原住民器物(圖三、四)。[5]馬偕曾經在淡水牛津學堂旁設立了一間小型的私人博物館，將採集的標本文物陳列在館內，做為學生上課學習的材料，也讓重要的訪客參觀。這大概是目前所知臺灣最早的一間博物館。

此外，他也運用一些歐美剛興起的人種學概念來解釋台灣原住民。馬偕當時已經注意到台灣原住民的體質特徵與漢人有不少差異性，與馬來人有不少相似性；同時他也意識到台灣原住民分為多種不同語言文化群體；因此，他在漢人慣用的生番/熟番分類基礎上，進一步根據地理分佈和文化的差異，將台灣原住民的種族分為四種不同類別：(1)居住在西部平原的 “Sek-hoan” (「熟番」)；(2)居住在宜蘭平原的 “Pe-po-hoan” (「平埔番」)；(3)居住在東海岸奇萊平原的“Lam-si-hoan” (「南勢番」)；以及(4)居住在山區的“Chhi-hoan” (「生番」) (Mackay 1896: 93)。當然，馬偕界定的原住民分類並不是人類學所標榜的科學性分類，而他的分類想法也並沒有運用在原住民展示當中。從馬偕在《台灣遙記》(From Far Formosa)書中留下的一段生動描述，可以大致想像當時淡水博物館的陳列方式和場景：

「(博物館)房間裡放有大量的收藏品，包括各類可以想到有趣的漢人、平埔番、或生番使用物品。藏品中包含有各種貝殼、海綿或珊瑚，都經過分類整理並有說明；此外也保存有各式各樣的蛇類和昆蟲標本。其中偶像的數量多到可以塞滿一整間廟，另外有祖先牌位、宗教儀式用具、樂器、道士袍服等與偶像一起換來的東西；以及農具模型和戰爭使用的武器等。幾個山地生番部落的東西在這裡也有陳列；其中有一件

[4] 例如在十七世紀荷蘭人圖像中呈現的臺灣原住民，形貌看起來類似美洲土著印地安人；而十八世紀中國人描繪的臺灣原住民，形貌像是中國西南少數民族。

[5] 目前馬偕的收藏，主要保存在加拿大多倫多的渥太華皇家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總計有超過600多件台灣文物標本，其中原住民標本約有400多件；胡家瑜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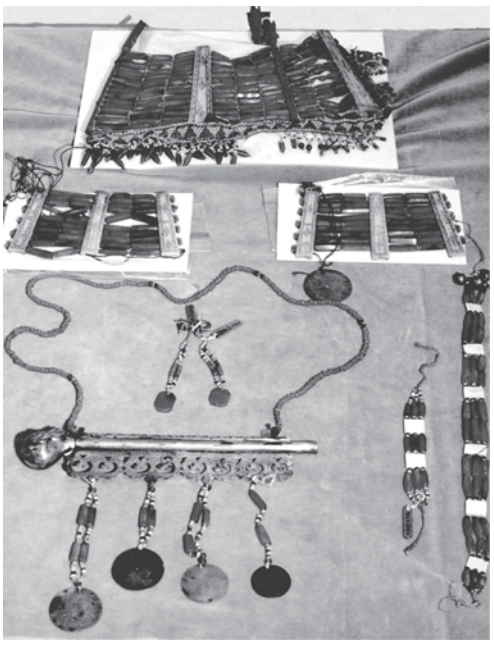
圖一　17世紀荷蘭人繪圖中呈現的台南地區原住民男子(Dapper 1670)



圖二　18世紀皇清職貢圖中呈現的台南地區原住民男子(傅恆等 1751)



圖三　19世紀末馬偕拍攝的盛裝北部平埔婦女(Mackay 1896)



圖四　馬偕採集的北部平埔新娘首飾，標本現藏於加拿大渥太華皇家博物館(胡家瑜攝，20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呎高的偶像(和我以前所見的偶像完全不同)，另外還有其他整套的器物收藏，可以再現生番生活面貌。這些東西有的非常怪異、有的令人悲哀、有的讓人害怕或是厭惡，因為暗示著野蠻的暴力和殘酷。此外，還有四件呈現福爾摩莎四種不同生活面貌的實體比例人像模型，從不同方向凝視著屋內全景。其中一個角落是道教的道士，身穿正式的紅色長道袍，一手拿著搖鈴召喚附身在人身上的惡魔，一手拿著鞭驅除惡魔。另一個角落是佛教的光頭和尚，穿著暗褐色的袍服，一手握著神聖的佛經，一手數著佛珠。和尚的對面是面貌兇惡的山地獵頭者，他的前額與下頷有刺青，身邊放著矛，肩上斜背著弓箭，腰間配有長刀，左手握著不幸受害者的髮辮。第四個角落是一個番婦，穿著原始的服飾，正在用織布機工作，就像在她們深山的家裡一樣。」(Mackay 1896: 288-289)

從上述描述文字，我們可以瞭解馬偕並沒有將原住民器物背後相關的環境和文化脈絡當做呈現的重點。其中原住民文物並沒有固定的陳列擺放方式，而是與漢人的宗教器物並列雜陳；整個展示廳主要是一間百物雜陳的「好奇心陳列室」。究其原因，可能與馬偕設立博物館的目的有關。根據馬偕自己的陳述，他身為牧師而如此熱情地進行標本收藏展示，主要目的是為了傳教；他認為透過呈現原住民怪異、野蠻、暴力等令人害怕厭惡的一面，可以讓人敬畏上帝(Mackay 1896: 291)。雖然他的動機可能有爭議性，但他開始有意識地採集標本，並設立博物館公開呈現原住民文物用作為學習資源；這樣的作法就當時台灣社會情境而言，已經是革命性的歷史創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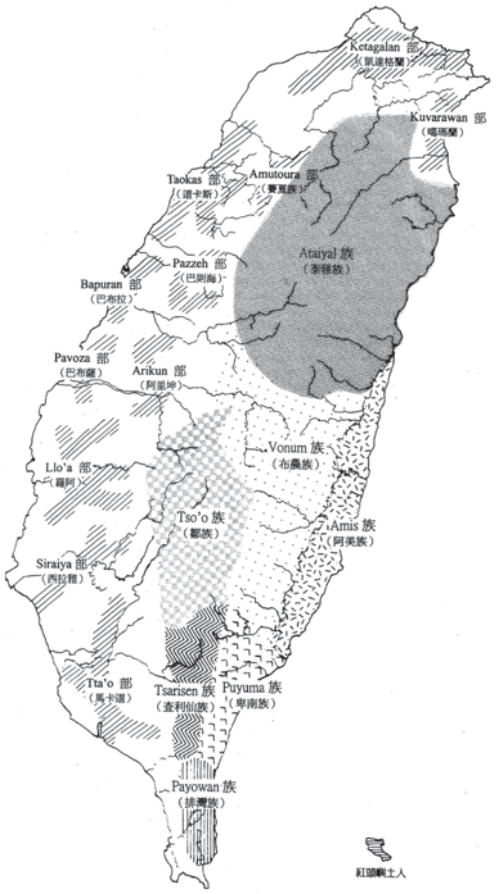
二、科學分類與族群形貌具體展現

1895年，清帝國將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觀看與呈現原住民的方式開始出現很大的變化。日本統治者在台灣這個新取得的殖民地展開了一系列有系統、有計畫的文化調查工作。此時，日本剛興起的人種學與民族科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幾位最早從日本來到台灣進行原住民調查的先驅者，如伊能嘉矩、鳥居龍藏、和森丑之助等人，是日後原住民知識體系建立和收藏展示開展的關鍵影響者。他們在19世紀末率先進入臺灣山區，有計畫地進行大規模實地踏查、並且運用訪談、田野攝影、和物質文化採集等新方法，展開細膩的記錄和研究。他們的調查成果，後來經常成為殖民行政的重要參考；而他們採集的原住民標本文物，也常用做為各種展覽中說明台灣土著文化特性的代表物證。

日本來台的先驅研究者中，伊能嘉矩對於原住民文化意象的形塑影響極為深遠。他懷抱著「人類的理學」和「科學的土俗學」研究的理想來台調查，10多年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進入將近一百多個原住民部落，採集大量的文獻和口述史料以及物質文化標本。伊能綜合歸納各類資料，提出他認為符合科學原則的臺灣原住民分類體系和命名；這是第一次打破長久以來漢人習用的歧視性「生番/ 熟番」分類。1898和1899年伊能發表的分類體系，劃分已漢化或較漢化的平埔原住民十族：Kavarawan (噶瑪蘭)、Ketagalan (凱達格蘭)、Taokas (道卡斯)、Pupuran (巴布拉)、Poavosa (巴布薩)、Pazzehe (巴則海)、Arikun (阿里坤)、Lloa (羅阿)、Siraiya (西拉雅)、和Ttao (道)等；以及未漢化的原住民八族：Ataiyal (泰雅)、Vonum (布農)、Tso'o (鄒)、Payowan (排灣)、Tsarisien (查利先)、Puyuma (普攸瑪)、Amis (阿美)、和natives of Botal Tobago Island (紅頭嶼土著)等(圖五)。[6]這一套分類命名，是最早開始引用人類學觀點和方法，以非歧視性名稱來區劃台灣原住民族群的邊界。類似的分類架構被其他調查者和殖民行政者廣泛運用，成為日後原住民統治管理和學術知識體系建構的基礎。此後雖然一些人類學和語言學者，如移川子之藏等(1935)、小川尚義(1942)、馬淵東一(1954)、土田滋(1991)、和李壬癸(1992)等人，持續進行台灣原住民各族的分類研究，並對伊能的分類提出了一些檢討和修正；但修正的範圍並不太大。伊能的分類可說是為台灣原住民族群邊界形塑奠定了最基本的框架。



圖五　19世紀末伊能嘉矩提出的台灣原住民分類架構(胡家瑜1998)

調查研究之外，伊能也積極進行標本採集、展示、以及博物館的設置規劃。他主要從人類學「物質文化」研究的角度出發，將採集來的物質文化標本，視為具體的文化要素。同時，他也經常挑選和公開展示一些形式特殊的器物，以此做為突顯族群邊

[6] 伊能分類的族名，原文中是以日文拼音的方式註記，文中所列族名係筆者根據發音，轉譯為羅馬拼音和現今常用的漢名。參考伊能1898a：304; 1899：1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界區隔和差異的物質符號。這種手法，在1898年淡水蕃情研究會開幕展覽海報和1900年巴黎萬國博覽會彩繪圖中可以明顯看出。1898年他在用原住民各族男女的黑白寫真照片，剪貼拼成一張展覽海報；1900年巴黎博覽會時，可能因為照片中各族人物的文化區辨特性不夠明顯，所以特地找來畫師重新彩繪各族相貌圖，並加上明顯具有視覺區辨效果的物質特徵；例如泰雅族男女所戴的竹管雕花耳飾、阿美族男子戴的的圓形銅片包飾耳飾、布農族的織花胸掛袋、排灣族的山豬牙帽飾、卑南族的織花佩袋等。藉著圖中具體物質符號的區別對比，各族相貌的差異更清晰地呈現出來(圖六)。[7]這種透過物質和圖像符號建構和區辨原住民文化的方法，後來廣泛運用在許多展覽中，成為大眾認識原住民文化特性的基礎。



圖六　1900年「巴黎萬國博覽會」展出的台灣原住民相貌圖(台大人類學系藏品#370)

總之，伊能當時採集的標本，不但涵蓋他分類架構中各族群的物質文化樣本，也包括社會生活中使用的各種器具，如生業用具、飲食用具、服飾、農具、武器、家屋壁板、獵首儀式器物、宗教信仰器物、交換媒介、樂器、到嗜好品等標本。對於這些標本，伊能相當用心地保留下來源出處、使用方式和情境等的文字或繪圖記錄，成為日後珍貴的資料。伊能採集的大量文物標本，除了部分送給東京博物館和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室外，1908年他返回日本時大都運回故鄉遠野。後來伊能在家宅旁邊蓋了一間「台灣館」，專門存放和陳列這些標本，並公開給有興趣的人觀看(圖七)。[8]不過，從留下的照片資料來看，伊能的

[7] 二張台灣原住民相貌圖像，請參見伊能嘉矩 1898b：卷首圖，以及台大人類學系藏品＃370。

[8] 根據當時「台灣館」的藏品目錄推算，伊能的臺灣標本至少有400多件，其中原住民文物所佔比例最大，超過300多件；遠野市立博物館1995。伊能收藏1926年時被台北帝大「土俗人種學講座」教授移川子之藏買回台灣，目前仍保存在台大人類學系陳列室；胡家瑜19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館」還是粗略地根據器物型制或材質來陳列物質文化標本，並沒有採用他開創的族群科學分類架構；展示所呈現的台灣原住民文化意象，在擁擠龐雜而缺少明確秩序的器物排列中，主要還是一個遙遠而有待開化的「他者」。

三、殖民展示與現代國家統治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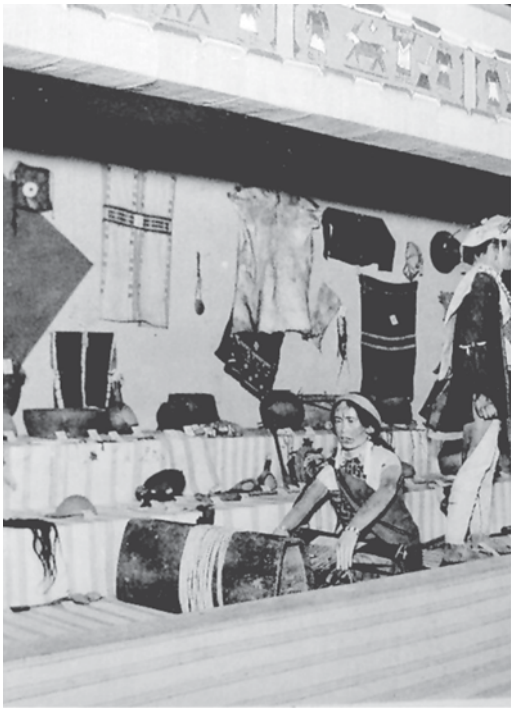
伊能嘉矩的例子，是日本取得臺灣後，政治統治有系統地與原住民研究結合，以便延伸管理和控制範圍的初期階段。1900年代之後，臺灣總督府為了深入山地進行開發，設置了更多原住民相關調查和管理機制，如總督府「臺灣舊慣調查會」、理蕃課和番務署等，委託各領域研究者在台灣山區進行大規模的調查採集。調查採集成果，經常安排在各種展覽會中向大眾公開展示。根據統計，從1900年代起至1930年代後期的三十多年間，日本政府舉辦的各類大小博覽會，連同1908年成立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可說是促使原住民標本文物採集和展示更加大量化和機制化的動力。在這些殖民展覽中，原住民相關展示的目的，主要是透過展示原住民的野蠻、落後和不進化，刻意對比呈現日本殖民者的進步、文明與現代化效率。

1900年起，日本政府參與或舉辦的各種國際博覽會、日本內地博覽會、或者後來在島內舉辦的台灣博覽會中，展示台灣原住民都是重要而受歡迎的內容項目之一。在這些大規模、短期性的嘉年華式展覽會中，原住民成為介紹台灣殖民地風土物產、獨特人種文化和教化發展狀況的最佳題材；例如1900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1903年的「大阪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1907年的「東京勸業博覽會」、1912年的「拓殖博覽會」、1910年的「倫敦日英博覽會」、1914年的「東京大正博覽會」、1916年的「紀念始政二十週年臺灣勸業共進會」、1935年的「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圖八)等，都曾設立頗



圖七　伊能嘉矩在遠野設立的「臺灣館」(其中標本現藏於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八　1935年「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的原住民展示廳(臺灣博覽會事務局1936)

具規模的「臺灣館」，並在其中展出原住民的人種、生業和土俗等。[9]這些原住民展覽，主要運用分佈圖、人口統計資料、相貌照片、住屋建築模型，以及「土俗」標本如服飾、農具、食具、樂器、武器、貨幣、儀式用具等展品(伊能1904)。其中「土俗」標本的展示，主要仍是以器物功能或類型分類做為陳列原則，綜合性地將各族同類器物放在一個櫥櫃單元中展出，旁邊偶而附加上少許說明文字。這些展櫃中的器物為了增加觀看時的視覺效果，經常被排列成有趣或怪異的形狀；但各個文物背後的社會脈絡和文化意義卻完全被忽略。[10]

殖民展示中，許多原本研究者希望採集來說明原住民文化觀念和想法的物質文化標本，經由器物的組合排列方式，傳達的反而是「落後」和「怪異」的視覺訊息。為了表現日本統治管理和現代化開發的能力，殖民展示經常凸顯台灣原住民的「原始」形象，以便對照說明日本殖民政府統治教化的成就，逐漸使得台灣和原住民步向文明進化之路。這種意圖很明顯地在1910年倫敦「日英博覽會」(Japan-British Exhibition)展示規劃報告中反映：「在入口處，通道的一邊放置著描繪原住民在山野環境中過著原始生活的實景模型，另一邊則放置著台灣人民在茶園中安和樂業工作的

[9] 伊能1899b：36、37；；坪井正五郎1903：302；伊能1904：76-83；月出皓編 1903；胡家瑜2005。

[10] 例如1905年大阪博覽會的『台灣館』；「蕃人的食具」櫥櫃中，各族的湯匙排成有尾獸形。「蕃人的武器」櫥櫃中，各族的刀排成箭形等，櫥櫃旁的加上文字說明：「在此將各種族的蕃刀擺放在箭頭形的架上陳列；最頂端放的是鏢槍頭。刀是蕃人唯一的武器。木刀之外，其他都是漢人供給的。鎗是他們最重視的東西，有時即使拿妻子也不能替代。左方是排灣族的鎗。刀槍上經常綁繫頭髮為飾，這是表彰殺過許多人的勇敢榮譽標示。又，此圖左邊還有鄒族的弓矢和盾牌，右邊是泰雅族的鎗。據說鎗是在迄今約一百五十年前左右才有的，當時漢人蕃俗記事中提到『生蕃僅擅長弓矢和鏢槍，而非常害怕砲火。聽見轟然一聲，就抱頭遠遁』。」；月出皓1903：56-57，胡家瑜20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模型。透過這樣的展出安排，說明在日本影響之下，台灣人由原始生活中進步的情況。」(Exhibition Commission 1910；胡家瑜2005)。除了靜態展示之外，真人生活展演也是當時頗受歡迎的一種手法。例如日英博覽會中設置有「福爾摩莎」和「愛奴」二個「土著村」。福爾摩莎村安排24名台灣南部牡丹地區來的排灣族男女居住，讓觀眾參觀他們的生活行為；並介紹：「福爾摩莎村居住的是一位知名旅行者所形容的『全球最凶猛、最頑強的種族之一』。當然，那是在1895年日本佔領這個島嶼之前。大家可以看見這些好戰的福爾摩莎山區居民，住在自己建造的獨特住屋中，進行他們的工作和活動。他們的戰舞讓人顫慄，從戰爭示範中，可以看出他們精通弓矢和長矛。」(Exhibition Commission 1910)。雖然這些原住民是受雇而來的表演者，但是以人做為展品，以生活做為展示內容，仍隱涵了強烈的操縱意涵，夾雜著展示表演和真實人生之間難以分界的弔詭。日英博覽會展覽期間，福爾摩莎和愛奴二個「土著村」都曾發生懷孕和生產的事件；根據報紙和雜誌報導，二村各有一名婦女在「土著村」中生下男嬰，其過程還變成展場的賣點(伊能，1910：125)。[11]總之，展示隱涵的權力關係，不僅是對物的掌控，也經常轉折成為對人的操縱，二者之間的界線曖昧模糊難以區隔；運用真人的生活展示更加容易出現這樣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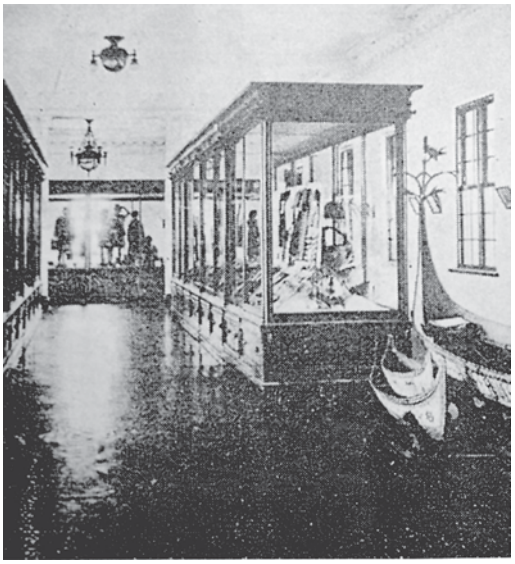
殖民時期的原住民相關展示，也涉及人類學家的參與或人類學知識的運用。例如伊能嘉矩、鳥居龍藏、或森丑之助等人，經常協助博覽會採集標本或規劃展示，希望藉此推廣人類學知識。不過由於觀眾主要是為了好奇和娛樂而來參觀博覽會，大部分不是對人類學的知識有興趣，因此研究者的目的很少能夠達到。倒是因為博覽會展示而累積的大量標本，後來時常成為博物館收藏或是新博物館設置的基礎；例如1908年台灣第一間正式設立的大眾博物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就是由「產業標本展覽會」變更為博物館的例子。這個博物館的主要性質，雖然從原本的「殖民產業」轉變為後來的「自然史」，但其中「蕃族土俗品」的採集和展示一直是重要工作。當時負責「土俗」展示解說的森丑之助認為，「蕃族展示」需要透過通俗簡單的方式，讓社會各階層的人都能感到興趣，以便傳達「蕃情知識」和「蕃情真相」。[12]博物館出版的

[11] 報導提到：「名為貝澤女的Ainu婦人於8月31日分娩一名男孩，命名為『Hitehiro』（英博）。9月25日生蕃村內名叫Rungayo的婦人也平安產下一名男嬰。這名婦人從台灣出發前已經與一名叫做Butsuaberi的男子有婚約，但是還未舉行結婚儀式。他們9月3日在生蕃村內根據固有的習俗舉行結婚儀式。當時成為許多觀眾注視的焦點。婦人9月25日臨產時，在場內愛爾蘭村的看護婦和博覽會委託的英國醫師看顧下，於早上8點生產；母子都健康，男孩命名為『Hiehiro』（日英博）。」；伊能1910：125。

[12] 1908年台灣總督府原本為了紀念台灣縱貫鐵路完工及迎接日本閑院宮載仁親王而舉辦展覽會，但卻因故而臨時改變計畫成為設立「殖產局博物館」；森丙牛生1999 (19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簡介手冊中，描繪「蕃族陳列室」展出狀況大致為：牆上掛有臺灣各原住民語言系統的分布圖；室內按照「雅美」、「阿美」、「布農」、「鄒族」、「泰雅」、「排灣」六族的分類，分別排列各族代表性文物，例如排灣族的木雕和琉璃珠，泰雅族的珠衣，雅美族的銀帽和船等；同時，還有各族藝術、織布和塑像等展品，用來說明其風俗容貌(圖九) (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編1939；李子寧2006)。這些陳列品大致被放置在進化論的架構展出，透過器物的製作技術與各族的風俗慣習比較，呈現各族的進化階序。然而，究竟觀眾從台灣第一間公共博物館的原住民展示中得到什麼印象或訊息？從一些學生的參觀遊記約略可知，對比宏偉華麗的博物館建築，大部分觀眾更加強化過去認定「生番」落後、野蠻、凶悍的刻板印象，對原住民的認識卻沒有太多增長(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編1939：348；錢曉珊2006：39)。



圖九　1930年代台灣總督府博物館蕃族室(青木文一郎1938)

綜合而言，殖民時期的博覽會和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展覽，對於原住民展示的主要動機、手法和造成的效果都具有相似性。這些展覽一方面強調通俗有趣和娛樂性，企圖刺激大眾對「原始」、「他者」的好奇想像，以此增加觀眾的參觀意願。另一方面則是運用野蠻落後對比文明進步，展現社會進化的標準階序，並透過物質標本和具體圖像，傳達「原始」、「自然」、「天真」，以及有待「教化」和「進步」的印象。有時，隨著展出場地和觀眾對象的差異，還可以透過原住民相關展覽，進一步暗示台灣社會的「原始」和「落後」狀態，藉此更加強化殖民者在台灣統治的合理性與必要性(胡家瑜2005；石川豪2005)。

四、學術研究與族群分類展示

殖民統治與台灣原住民展示的直接密切關聯，到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之後開始出現一些轉變。台北帝大設置的「土俗人種學講座」(現今台大人類學系的前身)是台灣第一所以人類學，尤其是台灣原住民族和南方民族研究，為主要目標的專業研究機構。1926年受聘籌劃講座的移川子之藏教授，為了累積人類學研究材料，從籌備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初就開始有計畫的收藏物質文化標本。他親自到日本將伊能收藏的台灣藏品買回台北帝大；後來又陸續透過購買或捐贈的管道，納入一些重要收藏家，如宮川次郎、宮原敦、伊東實、松山虔三等人的台灣原住民文物藏品。同時，他和講座助手宮本延人與學生馬淵東一，也在台灣各地的原住民部落進行田野調查，並採集標本和第一手脈絡資料。這些研究性標本大多保留了較細緻的脈絡資料記錄，包括採集地點、聚落、時間、採集者、以及相關功能或文化意義等。隨著標本資料數量的增加，台北帝國大學於1934年增建完成一棟建築物做為「土俗人種學講座」的附設標本陳列室，專門保存和展示人類學的物質文化標本(圖十)。完工後的陳列室，在1935年4月的開學紀念日舉辦展覽會對外開放。根據當時宮本延人的回憶，這間陳列室後來成為大學內一個極受歡迎的景點，有不少外地來的觀眾，甚至連日本皇室貴族訪台、或是原住民到台北觀光時都經常安排來此參觀(宮本延人1935；台北帝大文政學部史學科1936)。

相對於其他政府行政機構主導的原住民展示而言，台北帝大「土俗人種學講座」陳列室，由於隸屬學術機構，以推展人類學研究為首要目的，因此非常強調呈現原住民物質文化知識的客觀性。當時這所台灣第一間大學博物館的展示廳是設在一個長方形空間內，以展示櫥櫃分隔為二區。東側一小部分為考古陳列區，按照來源地區差異分不同單元陳列石器、土器、骨器、貝器、人骨、石棺等。其餘大部分展場空間則是臺灣原住民展示區，主要以族群分類做為陳列架構，將1930年代土俗人種學講座進行「高砂族系統所屬研究」後修正定案的台灣原住民族群，總計包括Pangtsa (阿美)、Atayal (泰雅)、Saisiyat (賽夏)、Tsuo (鄒)、Bunun (布農)、Paiwan (排灣)、Rukai (魯凱)、Panapanayan (卑南)、和Yami (雅美)等高砂九族，加上「熟蕃」平埔族等，分別設定為不同展出單元。各族分別挑選一些代表性文物標本，陳列在不同櫥櫃內；例如排灣木雕、阿美陶壺、泰雅貝珠衣、布農曆板、和鄒族皮衣等。另外，標本陳列室走廊，則展示台灣以外的較大型民族學標本，主要包括一些其他南方民族如新幾內亞的巴布亞族、菲律賓伊富高族(Ifugao)、或海南島黎族的標本，以及世界各種民族的毛髮標本等，作為民



圖十　1934年臺北帝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標本陳列室(台大人類學系藏品#C3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族學研究的比較參考。二次大戰之後，這一間標本陳列室雖然經過接管、改名和遷移等多次更迭，現今隸屬於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但是展示方式和展場風格仍然大致維持七十年前的屬性(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編1955、胡家瑜1996)。

1945年起，由於政權轉換和國民黨政府遷台，許多台灣本地和中國來台的學者陸續開始加入台灣原住民研究領域。此時期物質文化標本的採集、整理、研究和展示陳列，仍然是台灣人類學研究者強調的工作重點。甚至，隨著生活變遷和人群接觸互動的腳步加快，當時許多人類學者更加急迫地提出「搶救」的口號，希望藉由標本的採集收藏，保存「即將」在急速現代化過程中消失的原住民文化(芮逸夫 1953；陳奇祿1958)。也因為如此，大陸遷台的中央研究院，1956年在台灣成立了民族學研究所，以研究台灣土著民族文化，以及中國古代民族與太平洋土著文化接觸關係為主要目標方向。當時負責籌備民族學研究所的凌純聲先生也規劃設立了一間標本室，並開始採集台灣土著標本作為研究的物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6)。同樣地，民族所標本室中的台灣原住民展示，也是從學術的角度出發，將物質文化標本按照族群單元分類陳列，展出九族高山族，加上平埔族。不過，由於研究方向的略微差異，中研院民族所標本室中的台灣原住民物質文化標本，是與中國少數民族標本並列展出，而台大人類學系標本陳列室是與太平洋地區的南方民族對照。由此可知，即使是強調客觀學術知識的展示，不同場域中知識呈現組合的方式還是有差異，觀眾在展場中視覺對照參考的對象也並不相同。

由於人類學強調每一個文化單位都有不同的發展歷史和背景脈絡，因此上述人類學研究機構附設的標本室或陳列室，幾乎都採取族群分類展示。族群被認為是最具體的文化單位，族群分類展示也被認為是呈現文化整體性最理想的展示方式(移川1933；陳奇祿1958)。不過，學術取向的展示，雖然具有資料細緻嚴謹的優勢，但也顯現出一些問題：(1)透過展示具體化的各族文化差異，使得台灣原住民劃分為山地九族和平埔族的概念逐漸僵化定型；一直到2001年以後，長久以來無法變更的台灣原住民族群分類體系，才逐漸被打破。[13] (2)在人類學家眼中，原住民生產、製作和使用的器物，無論其種類型態為何，主要是用來說明文化概念和系統性知識；欣賞原住民器物的美感，很少成為呈現重點；也因此，許多參觀者在展場感受到的主要是陳舊沈重和時空凍結的文化意象，而不是美和愉悅的感受。(3)雖然人類學展示異文化主要是希

[13] 1994年「原住民」一詞正式立法通過成為台灣南島語系族群後裔的統稱。2001年起，原住民九族分類系統被打破，在一些族群強烈的正名要求下，政府陸續在此後數年間正式認定「邵族」(2001)、「噶瑪蘭族」(2002)、「太魯閣族」(2004)和「撒奇萊亞」(2007)為台灣原住民中的一族，至今已有十三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望透過研究和詮釋，復原再現標本背後的文化脈絡和意義；但是大部分學術展示由於空間和經費短缺，大都將器物隨意擺放在櫥櫃中，依賴少量文字或圖表說明；因此，呈現出來的訊息經常是斷簡殘篇、切割和靜態的，很難達到復原脈絡和呈現意義的理想。

大體而言，從戰後到1980年代，大概只有台灣省立博物館(前身為日本時代的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台大人類學系標本陳列室、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標本陳列室等三個人類學研究機構，是展示原住民文化的主要場域。將近三十多年的時間，其他博物館很少舉辦原住民相關展覽。這些學術性的族群分類展示，透過知識權威而逐漸定型為原住民文化呈現的典範；各族文物被標本化地隔離排列在玻璃櫥櫃構成的空間單元內，像是一隻隻不同類別的蝴蝶或蜻蜓標本，客觀、冷靜、有秩序但缺少生命。這樣的展示結果，距離人類學者復原再現文化脈絡的理想非常遙遠。同時，由於人類學研究機構本身並不是台灣社會主流價值呈現的場域，因此更加強了原住民文化被邊緣化的意象。

五、場域多元化與自我呈現的開展

從台灣社會變化的過程來看，1960年代起的二十多年間，可說是台灣博物館展示和人類學物質文化研究都停滯或衰退的階段；一方面由於國內博物館經費極缺乏，另一方面由於物質文化研究逐漸脫離人類學主流。同時現代化腳步加速和部落生活形態改變，使得符合人類學者理想的「傳統」、「真實」標本越來越難取得。多種政治、經濟和學術因素的綜合影響，促使台灣原住民相關收藏和展示，有很長一段時間幾近停頓。直到1980年代後期，隨著台灣經濟急速成長和政治解嚴開放，新提出的國家12項建設計畫的文化建設計畫中，將博物館籌建列為發展方向，才開始出現許多新的博物館、陳列室、或文化村等大眾展示場域。也因為如此，以本土文化和原住民文化為主題的相關展示機構，開始大量增加；例如，北投文物館(1984)、九族文化村(1986)、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1986)、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1987)[14]、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1994)、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2)，以及1980年代末期起陸續設立各縣市文化中心陳列室[15] 等。

---

[14] 這個園區原本由台灣省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規劃為「山地文化村」，1987年正式開放時定名為「臺灣山地文化園區」，1994年受到「原住民」正名運動的影響，更名為「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現隸屬於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管轄；也因為如此，目前園區聘用了不少原住民工作人員，同時也有不少與原住民部落和團體合作的計畫。

[15] 19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上半期，全國各縣市文化委請專家規劃，設立了約17間專題特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許多新設機構中的原住民展示，因為經費來源、規模大小、主要目標、主題內容和主要觀眾對象都不相同，展示的觀點、型態和手法也開始出現多元變化。有些採用主題或展示媒介分類安排呈現結構，有些以器物類型分類為原則區隔展示單元(如服飾、編織、木雕等)；有些展示強調學術，有些則偏重大眾教育、藝術欣賞、通俗娛樂或觀光經濟等。例如1986年完工開放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台灣南島民族展示廳」(圖十一)是在「中國科學廳」內的一個展場，主要以大眾性科普教育為目標；其展示呈現跨族群性地採用主題和手法分為幾個區塊，主要包括「入口蠟像區」、「圖表解說和文字」、「聚落景觀模型區」、「九族影像區」、排灣族石板屋模型區」、「雅美族造船模型區」、「多媒體影像區」、「工藝與藝術實物標本區」、「日據時期黑白照片區」等(許功明1998：136)。1994年私人企業設立的順益原住民博物館，比較強調器物美感的呈現，陳列架構主要則依展品類型，將各族標本文物綜合分為「人與自然環境」、「生活與器具」、「衣飾與文化」、和「信仰與祭儀」等單元展出。2002年開館的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台灣南島民族廳」(圖十二)，則結合主題和族群分類二種型態，採取一個族群一個主題呈現的方式，較深入地介紹經過挑選的代表性文化面向，例如「平埔族的族群關係」、「泰雅族的文化多元性」、「排灣族的聚落與建築」、「阿美族的兩性分工」等；「雅美族的海洋文化」、「卑南族的會所制度」、「魯凱族的生計方式」等；以及「賽夏族的矮靈祭」、「鄒族的戰祭和小米祭」、以及「布農族的巫術與精靈觀念」等。比較偏向休閒娛樂和消費觀光作用的文化村或文化園區，也因屬性和目標重點的不同，而有



圖十一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南島民族展示廳的入口蠟像區(胡家瑜攝，1994)

館，包括宜蘭縣台灣戲劇館、基隆市海洋館、台北縣陶瓷博物館、桃園縣傢具博物館、新竹市玻璃藝術館、苗栗縣木雕博物館、台中縣草編特色館、台中市台灣民俗文物館、南投縣竹藝特色館、彰化縣南北館特色館、雲林縣寺廟藝術館、嘉義市郊趾陶特色館、台南縣化石館、台南市民間傳統工藝館、高雄縣皮影戲館、屏東縣排灣族雕刻館、台東縣山地文物陳列室、花蓮縣石雕藝術館、澎湖縣海洋資源館等；其中有至少有5、6間特色館是以台灣原住民展示為主要內容或部分內容。資料來源參考邱坤良19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十二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台灣南島民族廳(夏麗芳攝，2007)



圖十三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內復原重建的排灣族石板屋(宋世祥攝，2007)

展示呈現上的差異。例如，「九族文化村」是台灣第一個以原住民文化做為呈現主題的遊樂園區，它以迪斯奈樂園為理想，強調製造和消費歡樂的經驗；園中複製展出的九族建築聚落，與歐洲宮廷花園區中的凡爾賽宮和哥德鐘樓，以及歡樂世界中的雲霄飛車和未來世界並置，提供觀眾快速的經驗和多樣的消費選擇。相較之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雖然也是以原住民建築和聚落風貌為展示主題，但這個園區由學者負責規劃，因此較強調復原「完整」和「傳統」的台灣原住民建築和聚落風貌(圖十三)。不過為了增加民眾觀光旅遊的興趣，園內也運用動態歌舞表演、360度環形劇場、原住民塑像館、工藝教室、和登山步道等休閒活動設施。

當然，原住民相關展示場域數量的增加，並不代表展示觀點和取向有很大改變；許多展示仍然呈現時空脈絡凍結的原住民刻板印象。展示中原住民的角色，除了零星在少數展場被聘用為工作者或示範表演者外，大部分也還是被展示的客體和「他者」(許功明1998)。最近十幾年，受到人類學反省思潮和新博物館學觀點的影響，一些博物館也開始嘗試突破展示詮釋者由館員或研究者主導的限制，邀請原住民擔任特展策展人。例如1995年起順益原住民博物館定期舉辦「與部落結合」特展，每次特展以一個族群為主題邀請部落族人擔任共同合作策展人(圖十四)；目前已辦過的展題包括如「鄒族的生活世界—HUPA、HOSA、KUBA」、「卑南巡禮—由獵祭出發」、「排灣達瓦蘭部落教室」、「布農族人經濟活動文化變遷」、「彩虹的故事—泰雅染織工藝」、「賽夏巴斯達隘祭典」、「原始!!魯凱族的傳統文化」、「阿美族的生活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慧—南勢阿美七腳川社」、「搖擺布錠：烏來原住民族紡織文化」、「移動的部落—都市叢林裡的原舞者」等。其他如台東史前文化博物館也有一些與社區結合的嘗試，如2002年起陸續推出「來自部落的聲音」和「回憶父親的歌」等展示，就是以原住民為敘事者，呈現當代原住民創作藝術家和著名音樂家的故事。雖然這些特展大多規模較小、時間較短，有時展場設施不甚理想，但它們脫離了民族學式的客觀、冷靜而疏離的立場，主觀而生動地表達對文化傳統或當代生活議題的關注；這些變化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受，也表現出原住民從跨文化被展出的「他者」轉換為自我詮釋者的意義。除此之外，有些部落基金會或教會，也主動發起的一些藝術創作和生態保育展示計畫，例如布農部落的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中心、鄒族山美社區的達娜伊谷生態公園、和泰雅族鎮西堡的生態博物館等，更有意圖地整合協調部落，展現主體意識和文化活力。



圖十四　順益原住民博物館『與部落結合』特展—魯凱特展(熊鵬翥攝，2002)

1990年代後期，地方博物館的建設在臺灣持續發燒，原住民各鄉鎮也紛紛開始爭取經費，在部落內建立博物館。最近十年間，全國各地總計設立了將近40間原住民部落博物館或文物館(圖十五、十六)。[16]這些博物館幾乎都設置在原住民的聚落內，直接影響部落生活範圍。許多原住民原本期待部落博物館的設立，能夠達到促進地方觀光、發展經濟產業、保存傳統文化和凝聚族群認同意識等多重目的。不過，許多部落博物館由於地點偏遠，人潮不易聚集；而且博物館管理機制經常無法與原有的部落組

[16] 估計*1990*年代後期至今全台灣大約成立將近*200*間地方文化館；其中原住民文物館約有*40*間，包括如台北縣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桃園縣復興鄉的羅浮村泰雅織布文物館、澤仁村泰雅生活文物館、三民村基國派舊教堂文物館；苗栗縣南庄鄉的賽夏民俗文物館；宜蘭縣南澳鄉的泰雅文物館、大同鄉的泰雅族博物館；花蓮縣吉安鄉的阿美文物館、壽豐鄉的原住民文物館、秀林鄉的太魯閣泰雅山地文物館；南投縣仁愛鄉的餘生紀念館；高雄縣甲仙鄉的小林平埔族文物館、桃源鄉的布農族文物館、三民鄉的原住民文物館；屏東縣牡丹鄉的原住民手工藝文物館、獅子鄉的文物陳列館、霧台鄉的魯凱族文物館；台東縣成功鎮的原住民文物館、海端鄉的布農族文物館、延平鄉內本鹿生活文化館、蘭嶼文物館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十五　2002年落成的苗栗向天湖賽夏民俗文物館(胡家瑜攝，2004)



圖十六　復興鄉泰雅織布工藝文物館展示廳(胡家瑜攝，2006)

織結合，造成原住民參與使用的機率並不高。同時，許多地方政府無法提供營運經費或博物館實務技術的協助，因此造成許多部落博物館雖然建築氣派美觀，但收藏、展示或營運等工作卻未能配合發揮功能。不少博物館落成之後僅能勉強開門慘淡經營，甚至有些長期關門，成為輿論批評的「蚊子館」或「蚊舞館」。近來有些部落博物館，開始以專案計畫方式，爭取運用有限的經費和人力，規劃安排一些具有自我觀點的展示；例如向天湖賽夏民俗文物館展廳的姓氏牆，以及海端鄉布農文物館2005年舉辦的「記憶種植─部落影像回顧展」特展等，可以看出地方的努力和創意。雖然這些部落博物館的發展還未成熟，許多問題還在摸索解決；但是對於台灣博物館運動和政治角力方向的變化而言，卻具有指標性的意義。目前的一些矛盾和困難，或許可以讓大家更進一步思考博物館與部落的關係，以及展示和營運必須面對的一些實務問題。

六、結　　語

檢視過去一百多年來台灣原住民展示的變化，可以看見不同時空脈絡下人類學、博物館和原住民之間的動態互動關係；其中涉及外來者對原住民的好奇觀異、國家統治手法的運用、和人類學者的知識建構，也反映原住民社群的角色和位置。展示中建構的原住民意象，由怪異可怕的野蠻人、待開化的土著、文化流失的高山族、到文化持續的台灣原住民，出現不同形貌焦點的轉換。[17]由前面的討論可知，原住民展示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一種特殊類型的再現場域和社會產物，其轉形變化是人群、器物、知識觀念和權力關係在不同時空脈絡下交互運作的結果。其中反射顯現的問題，主要可以歸納為二個層面。

一個層面是關於再現的問題，尤其是再現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和具體化(objectification)的問題。展示再現是在社會架構一種有意圖的行為操作，透過具像符號做為「視覺區辨」(visual distinction)焦點，建構觀眾的經驗或印象，並象徵性地表達價值和意義(Alpers 1991; Baxandall 1991; Hall 1997)。由於其過程涉及代表物的取得、挪用、和選擇，也需要經過安排者的組合與結構，因此必定牽涉政治經濟的運作關係。另外，再現的技術，也對具體呈現的結果具有重要影響；例如陳列的方法，究竟是運用玻璃櫃陳列、開架式展示、情境復原模型、塑像或蠟像、真人展演、影音多媒體、或整體性的僵化凍結或生動活潑感受等，都可能造成參觀經驗和記憶的深刻影響。

另一個層面是有關文化賦權(cultural empowerment)的問題。1980年代以降，受到全球博物館反省聲浪的影響，異文化收藏展示隱含的不對稱權力關係和跨界挪用本質越來越受重視；對於弱勢族群的重新賦權，也成為大家關注的議題。[18]因應國際風潮和國內政治生態的轉變，1990年代起，許多台灣原住民社群逐漸開始到各個博物館尋找過去的文物資料，並積極爭取社區發展經費和資源。前面提到展示多元化的發展、部落博物館的興建和自我展示的嘗試，都是在此情境下的一些回應。當然，原住民與博物館的新關係，夾著複雜而多層次的族群認同、經濟產業和文化觀光發展、以及政治操作等動力，很難找到簡單而完美的答案。但是，面對過去長期以來展示再現場域的權力不平等現象，如何增進大眾對原住民展示本質的瞭解、思考原住民自我表達的意義，或關注原住民運用過去文化遺產，延伸記憶、建構認同和創造政治經濟力量等議題，都需要有更多的討論和行動(Ames 1992; Belcher 1991; Brown 1990; Cassia 1992)。

總結而言，展示中的原住民，無論是做為對象的「他者」或是主動的「我群」；呈現的展品無論被視為奇珍異物、自然史標本、藝術品、文化器物、或是認同符碼，都在特定時空情境和資源條件下呈現部分意義。如同民族誌的書寫再現，展示再現也

---

[17] 展示中對台灣原住民的稱呼，歷經「番族」、「高砂族」、「高山族」、「山地同胞」、「土著民族」、到「原住民」的改變；原住民分類，也從生番/熟番、到六族、八族、九族，到現今還持續在變化中的十三族。原住民的身份角色，也從被動無聲的「他者」朝向主動發聲的「自我」挪移。

[18] 有關展示再現過程中權力不平等的反省和文化賦權關係的討論，請參見Cole 1985; Nichols 1989; Warren 1989; Fuller 1992; Clifford 1994; Gosden 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多元且可爭論的。沒有一種展示可以完整地再現文化全貌；但值得尋求的是細膩的對話，以及激盪出的深刻思考和感受。延伸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對符號意義的解釋，我們可以說：展示的意義，並不是來自於訊息對象，而是來自於顯露訊息的方式(Barthes 1989[1957])。台灣原住民展示所顯示的也不僅是原住民，還包括台灣博物館人類學的發展歷程，以及展示再現過程中建構的秩序、價值和權力關係。當然，理解展示再現的本質之後，如何運用不同技術打破原住民展示的靜態僵化印象，如何讓更多聲音能夠結合呈現更豐富動態的文化面貌；以及如何讓博物館資源和文化資產能對原住民文化延續發揮更積極正面的作用，應該是未來博物館和人類學需要更加關注的議題。

參考書目

小川尚義

1942 〈インドネシア語に於る台灣高砂族の位置〉，《太平洋圈》上卷：451-503。黃秀敏譯1993: 338-380。

土田滋

1991 《平埔族諸語研究雜記》(Miscellanies of Languages of Sinicized Ethnic Groups in Formosa)，pp.146-179，東京大學文學部語言學研究室。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86 《人類學家的博物館》。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月出皓編

1903 《台灣館》。台北：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台灣協贊會。

王嵩山

1992 〈博物館民族誌的概念與方法：兼及臺灣人類學博物館的初步檢討〉。《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4: 76-109。

石川豪

2005 《殖民教化與「未開化」意象的再現—以四個博覽會為例》。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台北帝大文政學部史學科

1936 《台北帝國大學開學式紀念展覽目錄》。台北帝大文政學部史學科。

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編

1955 《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標本陳列室陳列品說略》。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阪上福一編
1939 《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年紀念論文集》，台灣博物館協會。
任海
1993 〈博物館及其對臺灣原住民文化的製造〉，《山海文化》1: 29-35。
吉見俊哉
1992 《博覽會の政治學》。東京：中央公論社。
伊能嘉矩
1898 台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分佈，『台灣通信第22回』，《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46，1898/5。
1898b 蕃情研究會開幕式展覽，蕃情研究會誌，第一期，蕃情研究會，卷首圖&302。
1899 台灣ニ於ケル「ベイポ」族ノ概察，『台灣通信』第28回，《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54: 126-136。
1910 〈日英博に於ける台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26卷第297號：125。
1904 〈風俗上より見たる台灣館〉(1)(2)(3)(4)(5)，《台灣慣習記事》第2卷第6號：76-83、7號：77-85、8號：75-80、9號：86-89、10號：79-83。
芮逸夫
1953 〈本系標本收藏簡史〉，《國立臺大考古人類學刊》，1: 16-22。
李子寧
2006 〈藏品歷史與展示政治：台灣總督府博物館收藏與展示的生命史〉。「台灣歷史與文化國際會議論文」，2006/5/29-30，文化總會、臺灣歷史學會主辦，頁113-142。
李壬癸
1992 〈台灣南島民族的遷移歷史—從語言資料及現象所做的探討〉，《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2: 23-30。
李亦園
1992[1986] 〈人類學家與他的博物館〉，收錄於《文化的圖像(上)》。頁137-143。台北：允晨。
青木文一郎
1938 〈台灣總督府博物館三十週年紀念日に當りて〉，《科學の台灣》6(4): 1-4。
邱坤良
1993 《民國八十一年台灣藝文活動評估報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坪井正五郎

1903 〈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之人類學〉，《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206號，301-302。

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

2003 〈屍體或實體？以布農族小米田獵場的觀念看布農部落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中心與一般博物館〉，「批判、反省與實踐—百年來台灣博物館的原住民文化展現論壇」，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胡家瑜

1996 〈從民族學研究到異文化展示：由台大人類學系『原住民物質文化』特展談起〉，《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51: 148-171。

1998 〈伊能嘉矩的臺灣原住民研究與物質文化收藏〉，收錄於胡家瑜、崔伊蘭主編，《臺大人類學系伊能藏品研究》，頁37-65

2001 〈馬偕收藏與臺灣原住民印象〉，收錄於《馬偕博士收藏台灣原住民文物—沈寂百年的海外遺珍》，頁66-74。台北：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2004 〈博覽會與台灣原住民—殖民時期的展示政治與「他者」意象〉，《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2: 3-39。

2006 〈典藏臺灣物質文化：探索十九世紀民族學標本反映的臺灣意象〉，「臺灣歷史與文化國際會議論文」，2006/5/29-30，文化總會、臺灣歷史學會主辦，5/29-30。

胡嘉玲

2002 《博物館與原住民文化再現—順益原住民博物館部落結合特展分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宮本延人

1935 〈新裝の台北帝國大學の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及び標本室の概觀〉，《ドルメン》，4(1): 32-34。

馬淵東一

1974[1954] 高砂族ソ移動れプヂ分佈，原刊於《民族學研究》18(4)，後收於《馬淵東一著作集》第二卷，頁243-460。東京：株式會社社會思想社。

許功明

1994 〈博物館與原住民文化的展現〉，《博物館學季刊》8(3): 3-10。

1997 〈原住民觀眾對科博館台灣南島民族展示看法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2: 99-128。

1998 〈「順益與原住民」之我見—從展示談起〉，收錄於《博物館與原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民》，頁43-50。台北：南天。

2004 《原住民藝術與博物館展示》。台北：南天。

陳奇祿

1958 〈臺灣的博物館和人類學的發達〉，《台灣省立博物館科學年刊》創刊號，台灣省立博物館，頁1-8。

陳茂泰

1997 〈博物館與慶典：人類學文化再現的類型與政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4: 137-182。

陳錦豐

2001 《博物館及其對台灣原住民圖像的製造》。國立台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隆智

2002 《屏東縣瑪家鄉「原住民文化園區」的文化詮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

移川子之藏

1933 〈土俗博物館陳列型式二種〉，《科學之台灣》，創刊號，臺北：博物館學會。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

1935 《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第一冊、第二冊，東京：刀江書院。

傅恆等

1751[1968] 皇清職貢圖九卷，台北：華文。

森丙牛生(森丑之助)

1999[1925]《台北博物館的回顧》，台灣省立博物館創立九十年專刊，頁264-273。

喬宗忞

2002 〈人類學的再脈絡化：「照片會說話」特展的一個嘗試〉，《文化驛站》12: 29-31。

遠野市立博物館

1995 《伊能嘉矩—鄉土と臺灣研究の生涯》，遠野市立博物館，第31回特別展，伊能嘉矩渡台百年記紀念，頁54-63。

錢曉珊

2006 《殖民地博物館與「他者」意象的再現—三個殖民地博物館的分析比較》。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盧梅芬

2005 〈人味！哪去了？博物館的原住民異己再現與後殖民的展示批判〉，《博物館學季刊》19(1): 65-77。

Abram, G

1994 The case for Wampum: repatriation form the Musem of the Amerixam to Six Nations Confederacy, Brenford, Ontario, Canada. in *Musems and the Making of "Ourselves": the Role of Objects in National Identity*. F. Kaplan, ed. Pp. 351-84. London and New York: Leicester Universitu Press.

Alpers, Svetlana

1991 The Museum as a Way of Seeing. in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I.L. Karp, S. D. eds., ed. Pp. 25-32.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Ames, Michael M.

1992 *Cannibal Tours and Glass Boxes: The Anthropology of Museums*. Vancouver: UBC press.

Appadurai, Arjun & Breckenridge, C.

1992 Museums are Good to Think: Heritage on View in India. in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the Politics of Public Culture*. I. Karp & C. Mullen Kreamer & S. Lavine eds. Pp. 34-54.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Ave, J. B.

1980 Ethnographical Museums In A Changing World, in W. R.Van Gulik et al. eds' *From Field-case To Show-case*. pp.11-28.

Barthes, Roland

1989[1957] *Mythologie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nnette Lavers. New York: Noonday Press.

Baxandall, Michael

1991 Exhibiting Intention: Some Preconditions of the Visual Display of Culturally Purposeful Objects. in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I.L. Karp, S. D. eds., ed. Pp. 33-41.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Belcher, Michael

1991 Museum Exhibitions: Communication Functions, Modes and Types, in *Exhibitions in Museums*, pp.37-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ennett, Tony

1995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om

1996 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 in Reesa Greenberg, Burce Ferguson & Sandy Nairne eds.' *Thinking about Exhibitions*. Pp. 81-11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Brown, Ian W.

1990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ofile of an Exhibition, in *Hall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 Peabody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pp.4-7.

Bourdieu, P. & A. Darbel.

1991 *The Love of Art: European Art Museums and Their Public*. Cambridge: Polity Press.

Cassia, Paul Sant

1992 Ways of Displaying, *Museums Journal* 92(1): 28-31.

Clifford, James

1988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Harvard Univ. Press.

1994 On Collecting Art and culture. in *Art and Its Significance: An Anthropology of Aesthetic Theory*. S.D. Ross, ed. Pp. 621-42.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Commission of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1911 *Official Report of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1910 at the Great White City, Shepherd's Bush, London*. London: Unwin Brothers, Ltd.

Cruikshank, Julie

1995 Imperfect Translations: Rethinking Objects of Ethnographic Collection, *Museum Anthropology*, 19(1): 25-38.

Crane, Susan A.

2000 *Museums and Memory*. Standford, CA: Standford Univ. Press.

Cole, Dougls

1985 *Captured Heritage: the Scramble for Northwest Coast Artifacts*.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Dapper, Olfert

1670 Gedenkwae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uste e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 Amsterdam: Jacob van Meurs.

Duncan, Carol

1991 Art Museum and the Ritual of Citizenship, in Ivan karp & Steven d. Lavine ed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Exhibition*. Pp. 88-103. Washington &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e Press.

Duncan, Carol & David Ley eds.

1993 *Place/ Culture/ Represent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Exhibition Commission

1910 Official Report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1910 at the Great White City, Shepherd's Bush, London: Exhibition Commission, p.284.

Fuller, Nancy J.

1992 The Museum as a Vehicle for Community Empowerment: The Ak-chin Indian Community Ecomuseum Project. In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Debating Public Culture*. I.K.C.M.L. Karp, S. D. ed. Pp, 327-365,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Gosden, Chris, and Knowles Chantal

2001 *Collecting Colonialism: Material Culture and Colonial Change*. Oxford & New York: Berg.

Hall, Stuart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Karp, Ivan and Lavine, Stephen D. eds.

1991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esum Displa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Kirshenblatt-Gimblett, Barbara

1998 *Destination Culture: Tourism, Museums, and Heritage*. Berekeley & Los Angel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Krech, Shepard, III, and A. Hail Barara

1999 *Collecting Native America: 1870-1960*. Washington &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Macdonald, Sharon Fyfe Gordon, eds

1996 *Theorizing Museums*. Oxford & Cambridge: Blackwel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ackay, George L.

1896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 MacDonald, J.A. ed., Edinburgh &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Nichols, Deborah L., Anthony L. Klesert & Roger Anyon

1989 Ancestral Sites, Shrines, and Graves: native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the Ethics of Collecting Cultural Properties. In *The Ethics of Collecting Cultural Property: Whose Culture? Whose Property*? P.M. Messenger, ed. Pp. 27-38. Albuquerque: Univ. of New Mexico Press.

O'Hanlon, Michael

2000 Introduction, in O'Hanlon, Michael & Robert L. Welsch eds. *Hunting the Gatherers: Ethnographic Collectors, Agents and Agency in Melanesia*, 1870s-1930s, Oxford: Berghahn, 1-34.

Pearce, Susan M.

1994 *Collecting Reconsidered, in Interpreting Objects and Collections*, London: Routledge, pp. 193-204.

Phillips, Ruth B.

2005 Re-placing Objects: Historical Practices for the Second Museum Age,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86(1): 83-110.

Rowlands, Michael

2006 Heritage Memory and the Postcolonial Museum，「臺灣歷史與文化國際會議論文」，2006/5/29-30，文化總會、臺灣歷史學會主辦，5/29-30。

Shelton, Anthony Alan

2006 Museums and Museum Displays. in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C. Tilley, Webb Keane, Susanne Kuchler, Mike Rowlands, & Patricia Spyer eds., ed. Pp. 480-499. London: Sage.

Simpson, Moira

1994 *Making Representations: Museums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London & N.Y.: Routledge.

Stocking, George W.

1985 *Objects and Others: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turtevant, William C.

1969 Does Anthropology need Museum?, in Natural History Collection Symposiu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7 Nov. 1969, *Proceedings of the Bi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82, pp. 619-650.

Thomas, Nicholas

1989 Material Culture and Colonial Power: Ethnological Collect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lonial Rule in Fiji, *Man* 24: 41-56.

1991 Entangled Objects: Exchange, Material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in the Pacif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Urry, John

1996 How Societies Remember the Past, in Macdonald, Sharon & Fyfe Gordon eds., *Theorizing Museums*. Oxford & Cambridge: Blackwell, pp.45-68.

Vergo, P. ed

1989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Books.

Walsh, Kevin

1992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Museums and Heritage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Warren, Karen J.

1989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on the Ethics and Resolu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ssues. in *The Ethics of Collecting Cultural Property: Whose Culture? Whose Property?* P.M. Messenger, ed. Pp. 1-26. Albuquerque: Univ. of New Mexico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useums, Anthropology, and Exhibitions on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n Settings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Chia-yu Hu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n exhibiting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The complicate entangled processes between collecting ethnographic specimens, producing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and making representations of others are examined based on museum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Five major exhibitionary periods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differences of representational settings and driving forces: (1) the period of showing indigenous peoples as vague others and spectaculars; (2) the period of presenting indigenous peoples as systematically classified groups; (3) the period of exhibiting indigenous peoples as metaphors of the colonized savages in contrast to the civilized colonizers; (4) the period of displaying indigenous peoples as preserved cultural units for academic research; (5) the period of developing divergent representational venues and fields for presenting and showing self.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material images, social-political interactions and cultural premises on exhibiting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the meaning of objectific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power relation behind the exhibitions could be understood mor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oroughly in context.

Key words: representational setting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museum anthropology, quasi-museum institutes, exhibitionary complex, objectification, cultural empowermen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